

历史唯物主义 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学

——评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

陈 振 明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他致力于修正早期的批判理论,致力于“批判社会学”的建构,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的社会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建。如果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分别是批判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点和现实基础的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建则是这种社会学的归宿。哈贝马斯自我标榜说批判社会学是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本文将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的这三个基本问题作出评述。本文力图指出这种批判社会学的实质,揭示它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及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差别。本文所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批判社会学”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是资产阶级的一般社会学。

一、理论与现实

哈贝马斯首先要确立批判社会学或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最高理论类型的合法性。为此,他讨论了理论的实质尤其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从逻辑上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他批判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点或方法论基础;从历史上看,该问题则是他早期(50年代——60年代)理论研究的主题。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尤其是霍克海默在创立社会批判理论时,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的“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资产阶级经验社会学等等),认为传统理论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割裂开来,使理论研究变成一个脱离社会历史实践的独立王国。与传统理论相对立,社会批判理论要求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统一起来,它将理论研究看作社会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强调哲学的批判否定精神,它要使社会理论面向社会现实矛盾,批判社会,成为人们自由解放的工具。

哈贝马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思想传统,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但是,他认为,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主要利用历史哲学的方法去批判传统理论,过分排斥实证科学;早期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或否定的哲学,它同经验领域或语言领域没有理性的“沟通”。在他看来,重要的是要使批判理论与对社会情况作经验分析结合起来,使批判理论奠定在可靠的基础上。因此,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贝马斯的著作出现的主题是:批判理论必须以某种方式置身于“哲学和科学之间。”^①一方面,哈贝马斯否认实证主义方法,认为直接的经验分析科学不能洞察人类行为的本质;另一方面,他拒绝先验形而上学的空想,强调经验成分对社会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中,批判社会学或批判哲学应继承由康德到马克思的德国哲学思想传统,

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相结合。^②然而，在这一时期，他在论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为理性地指导实践而提出把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来领会的思想时，并未为他的批判社会学提供方法论基础和理论结构。

这方面的努力是他6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60年代末的两本主要著作《论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和《认识与人的旨趣》（1968），为他的批判社会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或理论前提。这两本书都力图通过对实证主义及其它的科学方法论统一性的观点的批判，来确立批判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的主题是对社会研究中的“理解”或解释性理解的性质和角色的思考，他考察了各种不同的以社会为对象的理解方式（包括新康德主义、韦伯的社会理论、社会互动论、人种学方法论、语言学和释义学等），得出了如下的基本结论：深入用符号化建构起来的对象领域，要求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中发展出来的程序根本不同的程序，这种程序设计要求把握对社会现实来说具有构成性特征的“意义”。《知识与人的旨趣》一书的主题是理论思想同人们的实际需要、旨趣、活动之间的联系。他指出，把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降低到同具体科学相同的学术地位，结果就会使它的作用变成不能对活动的价值和目标进行独立选择的社会技术主义；社会实践范围包括作为自觉主体的人们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往，它与对被动客体进行技术操作完全不同。他区别了三种理论类型和三种认识旨趣，认为三种理论类型分别是在这三种旨趣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说：“有三种研究过程的范畴可以用来证明是那种摆脱实证主义陷阱的批判的科学哲学的任务。经验分析的科学与结合了一种技术的认识旨趣，历史——解释科学的研究结合着一种实践的旨趣，以批判定向的科学结合着一种解放的认识旨趣，这种解放的旨趣植根于传统理论。”^③在他看来，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分别通过工作、语言和权威这三种中介而形成经验分析科学、历史解释科学和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早期的著作力图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范围内去解决批判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问题，以便确定批判社会学作为一种知识特别是作为一种最高理论类型的合法性。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一是各种知识类型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论程序，以及如何去建立它们的可靠性标准；二是批判社会学或一般社会理论与具体科学及哲学的关系问题；三是理论与实践的关联，特别是人活动的目的（旨趣）在知识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哈贝马斯自己并未解决这些问题，他为批判社会学奠定方法论基础并确立其为最高类型知识的尝试是不成功的。首先，哈贝马斯批判社会学的方法论程序是不明确的。他除了说“反思”是批判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外，并未给出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合法知识的客观标准，他甚至将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性也排除了；其次，他并不理解实践在理论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未能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将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相脱离，最终导致了对实践的绝望和戒除；最后，哈贝马斯并不能处理好批判社会学与具体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他徘徊于哲学的思辩性和具体科学的实证性之间，无可适从。

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看来批判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目标是完全以历史为指向的、同时又带有实践意图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建）。这主要集中在他的《合法性危机》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等著作中，而他的危机理论被人们视为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的最重要的贡献。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尤其是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批

判。他们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在科技进步基础上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异化论成为他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线。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马尔库塞眼里，“当代技术和科学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④马尔库塞将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

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的前辈特别是马尔库塞的有关论点，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与他的前辈有较大的差异。首先在立场上就有较大的区别。他离开了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立场，采取了一种改良主义的立场或态度。他并不象他的前辈那样，将当代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罪恶，而是视为历史演化的一个阶段。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综合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在早期的著作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68）中，哈贝马斯指出，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即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科学技术日益取得统治地位而成为名列第一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把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布局 and 目的合理的基本制度冲得土崩瓦解。哈贝马斯特别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和老一代批判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和人对人的双重统治作为基础的论点来论证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的基本结论是，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⑤

上述的这些观点在后来的《合法性危机》（1973年）得到了全面的发挥。该书指出，后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辩护自己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侵蚀，只好从技术统治中寻找依据，用技术统治论的变种来取代社会存在的思想和目标的传统意识形态纲领。这种技术统治意识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即人们的工作或劳动派生了一种技术旨趣：一种驾驶和控制自然、索取自然资源旨趣，它产生了经验分析科学，这种经验分析科学被哈贝马斯和他的前辈称为工具理性；或韦伯所称的“手段——目的的合理化”，即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效率标准成为评价社会行动和人们解决问题方法的指导。后期资本主义通过对工具理性的强调来取其他行动类型（如朝向相互理解的行动）。在这一时期，公众事务不再被认为是人们可以讨论与选择的领域，它们变成了专家使用工具理性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这就是国家干预下的“要求民众的非政治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的干预及工具理性的成长，已经濒临到一个危险关头，在这种关头上，就有可能形成他所谓的“否定的乌托邦”（negative utopia）。公共决策的日益合理化，已经达到了社会组织和决策都交付电脑处理，且完全排除于公众讨论范围外的地步，这就出现了各种新的冲突形式。因此，如果我们要避免丧失人控制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对这些新的冲突形式加以了解，在这里，哈贝马斯提出了他著名的“危机理论”。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子系统：（1）经济的；（2）政治——行政的；（3）文化的。在划出这些子系统之后，他列出了四种形式的危机，即：（1）“经济危机”——是由于经济子系统不能产生足够的生产率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引起的；（2）“合理性危机”——是当政治——行政学系统不能作出足够数量的工具性决策时产生的；（3）“动机危机”——当行为者不能使用文化符号引发充分的意义使其感到有义务完全参与社会时出现的；（4）“合法性危机”——是当行为者不具有“必要数目的广义动机”或者不信任政治子系统之决策权时出现的。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危机形式不是经济危机，而

是动机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因为随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创造出一个极权国家，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向于从无力产生足够的商品或无法作出充分的政治决策，转变为无法产生对政治过程给予充分信任和行为者个体之间充分的意义水平。

1974年10月在德国政治科学学会会议上，哈贝马斯提交了题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文，对《合法性危机》一书的主要论点作了概括和进一步的阐发。该文的中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法化问题是植根于它们自身结构内部的基本冲突的产物，这一冲突存在于两极之间：与大众民主相应的社会福利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国家不得不在若干限制性情境中去处理经济过程中的功能失调的效果面，即在世界经济范围中寻求经济稳定政策与社会改革政策的平衡。所有这些都进一步限制了个体国家的行动范围，但又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的一体化，故产生了“计划意识形态”。就国家不能把这些效果面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言，合法化问题便出现了。如围绕分配经济动荡等问题日益尖锐化的斗争，改革政策的夭折，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本质意义的动力模式的分解和功能失调在结构中的日益扩散等。

总之，哈贝马斯在批判地继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颇为独到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和某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他力图使批判的社会具有现实感，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相结合。他的确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影响，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上的某些新变化和新特征。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是颇有启发性的，这不仅在于他对具体课题的透彻的分析，而且在于这种分析体现了理论的本质精神，即理论研究必须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探讨并解决时代的迫切问题。不管哈贝马斯的具体观点正确性程度如何，他这种使理论面向社会现实，力求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加以理论上的把握的理论研究态度是有可取之处的。

但是，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并未能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他因这种新变化和新特征而否定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剥削实质，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经济政治危机，而且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因此，在他看来，社会理论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而应该是对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批判。他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离开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主义立场，而倒退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改良主义的立场中去。他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合理的政治机构，建立一个纯粹交流思想的舆论制度等措施来使资本主义往合理的方面发展。正如很多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这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现代乌托邦幻想。

事实上，在当代西方社会，国家干预经济、垄断资本的力量与国家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质。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更加尖锐，它仍然是雇佣制度，工人依旧是被剥削的对象。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无法使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它非但没有消灭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是陷入全面的危机，文化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也随之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过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仍然是第一位的事情。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在《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与人的旨趣》等著作中对批判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思考，在《合法性危机》等著作中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分析，但这些著

作都并未提供批判社会学理论的最终结果。这种结果主要体现在他70年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3)和《交往与社会进化》(1976)二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的核心,或者说,批判社会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因为哈贝马斯往往将这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社会批判理论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改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分析批判以及对其某些理论成分的吸取是早期批判理论家们的一个研究主题。他们主张将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主张用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观点来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例如,马尔库塞宣称《手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人的本质的确定才是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与他的前辈相似。例如,他同样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已过时,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最有成就的或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已被埋葬在一种工具性或实证主义混凝土之中。但是,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走的是一条与他的前辈(特别是马尔库塞)十分不同的道路,他重建的规模、成就和影响等都远远超出他的前辈。

什么是“重建”呢?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重建”就是把一个理论分解,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⑥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就是要批判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基础概念和假设,指出应用这些假设将出现的困难,进而提出论证并解决这些困难而设想的建议。^⑦换言之,他要首先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识别出其错位并加以排除,最后用他自己的理论取代之。

因此,批判社会学建构的第一步的工作是辨伪或剔错。在此他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认为科技进步已极大地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之基础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学说,以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等都过时了。例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学说,他认为,这对范畴是同自由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这对范畴及其相互作用的原理就不再适应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人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也不大了。而由于科技进步使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没有能力管理企业,他们的地位被掌握科技和管理经验的经理集团所取代,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也不起作用了,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过程以外的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交往关系,科技发展排除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排除了所有制对生产的影响。他还认为,由于国家调节等因素的出现,生产关系原先所具有的职能变成了历史上过时的东西,而科学技术由解放的潜力变成了统治的手段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伟大解放力量的信条也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了。

批判社会学理论建构的第二步的工作,是为批判社会学或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一个新的普遍基础,并提出各种新的理论观点或假说以取代旧的。哈贝马斯早就认为,批判社会学的规范——理论性基础必须到人类水平上有特色的、到处渗透着的生活中介那里去寻找,这就是语言。因此,以语言为中介的一般交往理论和社会化理论便成为批判社会学的基础。他确立了一个宏大的由三个层次组成的批判社会学的研究方案,即:(1)基础的层次——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普遍语用学);(2)中间层次——关于一般社会化理论(交往资质发展理论);(3)最高层次——关于社会进化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从奠定“普遍”行为的基础出发,将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的发展全部纳入统一的批判社会学的框

架，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作为个体发生学与作为“种”的人类进化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两种演变系列的依据。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社会进化被设想为两种侧度并列的学习过程——认识与技术的学习过程，道德与实践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经历的诸阶段可以在一个发展逻辑中结构性地加以描述和排列。依他自己的说法，他要吸取与历史唯物主义竞争的学派特别是人类学中的新进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合理因素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用自己的各种理论或假说来取代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他主张用“劳动”和“相互作用”或“交往”这对更抽象的范畴来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他说，马克思曾通过对人类劳动的透彻分析，找到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可惜马克思把理论反思变成简单的政治策略，把理论降低到实践或使用工具的水平上。这个错误形成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根据生产的模式来理解反思。相反，黑格尔就从来没有抹煞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区别。因此，必须回到劳动或相互作用的区别上。哈贝马斯把劳动理解为有界限的活动或工具行动，它可以分为使用工具的活动和策略两个部分，同反思基本上相符合的“相互作用”或交往活动是由符号促成的，并以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为前提。他宣称，只有借助于他对“劳动”和“相互作用”这对范畴的分析，才能理解“技术理性”社会演变的内在规律，他证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联系，从而把历史过程归结为“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冲突。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要在一般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去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力图将批判理论与对社会的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克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辨性缺陷。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个开放体系，力图吸取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成就，以及各种与历史唯物主义竞争的学派的一些思想因素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说，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是有贡献的，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并且补充了新的理论要素并展开了新角度的研究。不管其理论的正确性如何，这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一次尝试。

然而，哈贝马斯重建唯物主义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他提出的批判社会学的宏大理论框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他的重建太“彻底”了，他几乎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部否定了，他实际上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另起炉灶。他的批判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回事。他在考察马克思的理论时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他要求使这种理论完全脱离社会关系。事实上他放弃了马克思关于在社会关系中理解理论的要求，从而退回到马克思甚至黑格尔以前的理论观念上。哈贝马斯对社会理论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解有重大的差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旧的哲学传统的批判和克服，而哈贝马斯则想在旧传统的界限重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错误地将马克思的理论归入传统哲学之中。

总之，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它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尽管它其中也包含某些合理的理论成分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之加以分析批判，对于捍卫、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注释 ①哈贝马斯：“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载《理论与实践》，波士顿英文版，1973年，第195—252页。②哈贝马斯：“与社会哲学相联系的古典政治学说”，载同上书，第41—81页。③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旨趣》，波士顿英文版，1971年，第308页。④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哲学译丛》1987年第6期。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载《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英文版，1971年，第84—85页。⑥⑦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8—99，134页。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责任编辑 崔放玲】